

《青年文史》第一期十一月出书

经过一段时期紧张的征稿筹备工作，由省政协文史办主编的《青年文史》将于十一月创刊，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各新华书店发行，全书约十二万字，估价七角。刊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所题，主要供广大青年和文史爱好者阅读。本期设有十个栏目，二十多篇文章，在“史林漫笔”栏目中，有章开沅的《青年人需要学点近代史》和林增平的《学史琐谈》，前者阐明了学习近代史的重要意义，后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了治史必要的毅力和方法，读来十分亲切，给人以启迪。在“青春的足迹”一栏里，有沈文青写的《程潜的青年时代》和杨第甫、刘斐章等所写自己年轻时一些惊险曲折的经历。在“人物春秋”一栏里，有关于宋教仁、张治中、老教育家陈奎生等人的事迹片断，还有徐盈回忆邓宝珊将军的文章和陈旭麓撰写的《小凤仙其人》。在“历史的钟声”一栏里，除了战时湖南儿童保育院长齐新回忆该院当时苦难的遭遇外，还有杨仁追记1931年我国第一支女篮出国比赛的文章，并附有这支女篮队员的集体照片。在“耻辱柱上”栏目里，有沈醉写的《戴笠的另一副面孔》和吴松庚写的《三湘巨孽陈光中》，充分揭露了戴笠的伪善面目和陈光中骇人听闻的罪行。在“诗文赏析”一栏里，有羊春秋、弘征等对柳宗元两首渔翁诗和对于右任诗词的分析评价。在“武林故事”栏目里，有彭肇藩的《1932年湖南第二届国术比赛目击记》，详细记述了湖南武术界柳森严、顾汝章等人打擂的真实情况，笔调幽默，饶有兴味。在“政治秘闻”栏目里，有秦峰的《杨度入党秘闻》，对杨度入党年月作了一番考证，披露了一个长期被湮没的史料。

本期内容丰富多彩，熔史料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炉。文字清新流畅，有的文章颇富文彩，值得一读。（唐风）

湖南文史通訊

一九八五年第三期（总第11期）

目 录

主

文 史 工 作 动 态	民革湖南省委举行第二次文史工作会议……求 实(1)	
	衡阳市召开文史工作会议布 置下半年的四项任务……李岳平(3)	
	沅江政协与全国三十个单位交换文史资料 ……周一青(2)	
	武冈洞口两县召开第一次文史 资料工作协作会议……关仲华(4)	
	石鼓乡成立文史资料通讯组……赵志超(5)	
	《南昌起义前的贺龙史料汇编》 工作碰头会议在桑植召开……(6)	
	经验参考 我们是如何抓落实征集工作的……唐华元(7)	
	小 论 坛	把静的工作变为动的工作……肖志华(9)
		浅议文史资料与地方志的关系……周一青(11)
		有感于勘误表……李启光(12)
本 刊 专 访	古稀老人撰稿忙 ——访醴陵市政协副主席陆承裕……单先太(13)	
	幸福的归宿 ——访李宗仁先生的原配夫人李秀文……江 沔(16)	

- 第一次长沙会战亲历记 章异之(22)
纪胜
纪念利回回忆抗日英雄王甲本将军
抗四 李印西 潘 茂 钟 旭(29)
日十
战周
争年
缅怀以身殉国的谢介卿团长 彭子健(39)
国共合作抗战述略 毛羽芳(41)
国共合作抗战述略 钟启河(34)

- 。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要目
(出版信息) 省政协文史办(封底)
。 《青年文史》第一期十一月出版 唐 凤(封二)
株洲市政协出版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史料专辑 朱 文(21)
《攸县文史》第二辑出版发行 陈金华(42)
《长沙文史资料》第二辑已出版 易延义(43)
《大庸文史资料》第二辑将向大庸市成立大会献礼
 大庸市政协(33)
《衡东文史》第一辑出版 曹德苏(44)
《桃江文史资料》第二辑国庆前出版 夏家让(44)
《临湘文史》第一辑问世 刘国良(28)
《沅江文史资料》第一辑已出版分发赠完 周一青(38)
宁乡县编印第三辑文史资料 周德民(15)
- 新闻图片** 马壁教授第五次回长沙 欧阳耀祥(封三)

封面题字 周谷城

湖南省政协文史办公室编辑出版

长沙市潇湘印刷厂印刷

地址 长沙市迎宾路5号

电话 26576

民革湖南省委举行第二次文史工作会议

民革湖南省委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于6月1日举行第二次（扩大）会议，肯定了成绩，研究讨论了进一步开创文史资料工作新局面的问题。会议由省委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吴世法主任主持，龚业隆同志汇报了去年以来征集文史资料工作的情况，传达了湖南省、州、市、县文史资料第二次协作会议精神。民革省委徐君虎主委到会讲了话。

去年以来，全省民革成员撰写了文史资料142万多字。编入湖南省参事室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的即有15篇，占选辑总篇数的50%以上，万天石潜心武术史料研究，写了22篇文史资料，所著《武林传奇》、《平江不肖生传奇》两书即将出版。国家体委为表彰万天石同志挖掘武术资料的成绩，去年6月，在承德举行的全国武术史料挖掘整理成果报告会上，万天石被评为挖掘武术史料先进个人。黄福荫所写抗日战争中武汉会战的亲历记三篇已编入全国政协主编的抗日战争史料丛书。会议经过认真的讨论，提出了《征集文史资料的意见》，要求民革各市市委和省直各支部，进一步开展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深入发动、广征博采。工作中要把握一个方向，即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要存真，要实事求是”的方针。各

级民革组织未成立工作组的应成立工作组或指定专人负责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组织和鼓励成员撰写，以“三定”的方法（定人、定题、定交稿时间）征集史料，提出组稿名单和“抢救”名单。

（求 实）

沅江县政协与全国三十个单位交换文史资料

周一青

湖南省沅江县政协非常重视文史资料的编纂出版和交流，自去年初《沅江文史资料》第一辑出版以来，该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与省内外一些上级政协和兄弟县、市政协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交换文史资料，到目前为止，已有云南省昆明市、四川省重庆市、重庆市沙坪坝区、开平县、平都县、简阳县、万县、江苏省连云港市、常熟市、沙洲县、无锡县、黑龙江省饶河县、吉林省吉林市、山东省营县、浙江省奉化县、定海县、海南岛海口市、广东省中山市、梅县市、湖南省长沙市、株洲市、常德市、津市市、宁乡县、南县、益阳市、益阳县、安化县、桃江县等市、县政协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以及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给本会惠赠了文史资料。这些上级政协和兄弟县、市政协的文史资料内容十分丰富，编纂质量较高，给了我会极大的启发和帮助。

衡阳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于六月十八日召开了文史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市辖各县(区)政协、各民主党派主管文史工作的同志共三十七人。

会议就如何进一步搞好史料工作，研究了以下四条意见：第一、必须充分宣传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性质、特点和意义，争取党政部门的重视与支持。第二、继续把征集工作放在首位。要加强征集工作的计划性，拟定征稿题目和对象名单，要采取多形式多渠道的方法，或以题找人，或因人出题，或当事人自撰稿件，或请人代笔等，对掌握了重要史料的老年人士要重点抢救。第三、认真做好编辑出版工作。各县(区)、各民主党派必须量力而行，即要在有相当数量的存稿和人力、财力许可的情况下才能考虑出书，而且要保证所出的选辑具有一定的质量。市文史办要加强编辑力量，进一步搞好出版发行工作，力争在今年下半年再编印两辑(即第四、第五辑)；并从第四辑起，改进装帧设计，实行图文并茂，把握校对关，提高刊物质量，缩短出版周期，把出版工作搞得更好。第四、扩大、培训文史队伍。市文史办准备下聘书到城区和县区，聘请一批爱好文史，对地方历史沿革有一定了解又具有写作能力的同志为文史资料稿件撰述员，以联络各方人士撰写文史资料。为此，市文史办最近召开了城区撰述员的专门会议，进行了业务训练，并正在考虑举行县区撰述员的会议。

衡阳市召开文史工作会议

布置下半年的四项任务

李岳平

武冈洞口两县召开第一次文史资料 协作会议

武冈、洞口两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第一次协作会议于，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在武冈召开。

武冈、洞口原是一个县，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搞协作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双方的意愿。

通过这次会议，两县的同志深切地感受到协作的好处：第一、征稿史实的纲目更清了，能相互补充，相互纠正，相互审理；第二、稿源渠道更多了；第三、撰稿队伍扩大了；第四、工作效率更好了，人力物力的重复浪费减少了；第五、搞好文史工作的信心更足了，畏难情绪消除了。大家一致认为，这次会议，既是协作会，又是促进会。

会议协商达成了一九八五年的协作项目。

一、中央军校第二分校在武冈的情况。（其中包括校本部及其所属各期各总队的组织机构、教育训练内容、大队长以上人物，特别是李明灏、周盘、李亚芬、刘公武等人的小传），这一专题，由武冈县政协承担组稿任务，洞口方面将有关资料，于一九八五年九月底以前寄交武冈县汇总，十月份再由两县合

作举行定稿讨论会。

二、抗日战争雪峰山战役纪实（其中包括江口战役、回马山战役、扶冲战役，日寇暴行和两县人民英勇抗日的事迹等），这一专题，由洞口县政协承担组稿任务，武冈方面将有关资料，于一九八五年七月中旬以前，寄交洞口县汇总。

在会议上，双方交换了征稿题目，根据这些题目，凡是能够提供一定史料的，双方皆应发动写稿，稿件内容，涉及到那个县就输送给那个县，要求做到通力协作，毫无保留。

（关仲华）

石鼓乡成立文史资料通讯组

赵志超

湘潭县石鼓乡文史资料通讯组自今年三月成立以来，积极扩大通讯员队伍，广泛征集、整理有关本乡著名人物、事件等史料，并组织专人抓紧撰写。该通讯组原只三人，现发展为七人。他们中有的是退休教师，有的是在职教师，有的是熟悉当地历史的老人。去年十二月，退休教师任德福在县政协参加文史资料通讯员会议后，向乡政府作了汇报。今年三月，乡党委召开通讯员和部分教师座谈会，布置征集整理本乡文史资料，成立通讯组。目前，石鼓乡文史资料通讯组已撰写出《振铎校史》等六篇史料，并寄给了县政协文史办。

《南昌起义前的贺龙史料汇编》

工作碰头会议在桑植召开

根据第二次州、市、县文史资料工作协作会议精神，由湘西自治州政协牵头的《南昌起义前的贺龙史料汇编》工作碰头会议，于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在桑植县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湖南省政协和湘、鄂、川、黔边区部分州、市、县政协的代表三十九人。领导小组负责人田荆贵、李鳌、丁江等在会上讲了话。

与会代表总结了工作经验，交流了前段征集工作情况，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重要线索，就进一步共同搞好《南昌起义前的贺龙史料汇编》的征集、整理和汇编工作进行了具体研究、协商，并取得了一致认识。明年三月二十二日是贺龙诞生九十周年纪念日，会议决定在此之前出版《南昌起义前的贺龙》一书。

(桑植县计委)

我们是如何抓落实征集工作的

· 唐 华 元 ·

我们从实践中体会到，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光靠大会号召，发征稿启事是不成的，还必须狠抓落实。要把人们在几十年前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从脑海深处挖掘出来，确实是一项相当细致、繁复的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何况一些掌握史料的老同志，或有顾虑不愿写，或因文化不高而不善写；加上有的同志对这一项工作不够重视，认为是“软任务”，可以“慢慢来”，不象抓工农业生产那样是硬指标，有时间性。这就使文史资料征集工作

更为艰难了。因此，光有一般号召，只打雷、不落雨，“软任务”而没有硬措施，是无济于事的。

为了完成征集任务，我们除了会议号召、发动，讲清征集工作“人在史料在，人亡史料亡”的紧迫性之外，着重抓了会后的落实。首先我们与各县、区，各单位协商，把征集任务分配下去，由各单位、各部门摸清征集对象特别是“抢救”对象的底子，列出名单，注明各人可写的史料内容，定出联系

人；自己不能动笔的，要还组织人分工记录、整理。我们要求联系人应做征集对象的知心朋友，本着“三顾茅庐”的精神，登门拜访或探病，以诚相见，互通心声，解除其顾虑，相机组稿。第二，我们多次下到县、区、乡进行检查、督促。在检查中了解到许多单位的征集工作已基本落实，做到了“三定”：定征集对象、定征集内容、定联系人。对这样的单位我们进行鼓励，并提出新的要求，使之更上一层楼。还有一些单位对征集工作不够重视，没有认真抓起来，我们就帮助其进一步落实。第三，一些重要的史料，我们文史办办公室的同志亲自下去组稿，找到征集对象，提出具体要求，或由我们自己记录、整理。第四，对各单位的征集工作，我们还交代了具体的方法，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征集。目前，许多单位采取发函征集，外出调查；召开座谈会，进行集体回

忆写稿；个别征集，上门走访；配合革命纪念活动，如纪念抗日战争四十周年，向有关老同志组稿；重点征集与专题征集相结合；利用旅居他乡的老同志回乡探亲的机会组稿；因人出题或以题找人等方法进行征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据统计近几个月来已征集各种史料九十多篇，三十多万字。现在稿件源源不断地送来，改变了过去那种“等稿上门”、“无米下锅”的现象，我们预料，到年底将超额完成全年征集史料一百六十篇，五十万字的任务。



把静的工作变为动的工作

肖志华

邓颖超同志在政协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政协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活动性的工作”，“要进行协商，要开会，要讨论，要做决定”；“还有另一个方面的工作，就是静的工作，文史资料工作就属于这一类”。 “当然这也是相对而言的。但是从其效果看，它又可以发展成为活动性的工作，扩大我们的活动领域”。这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又一创见。

对这一创见，我们《武汉文史资料》是有着较为深刻的体会的。我们通过征集稿件，组织编审队伍，召开各种座谈会，把武汉地区的一群有阅历、有影响的老人，吸收到政协的周围，把党的温暖倾注在老人的心上，他们纷纷表示要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献余热。有的带着开玩笑的口气说：“文史办起了小政协的作用。”还有的说：“文史办把我们变废为宝。”

通过出版，我们排除“左”的干扰，不顾“手伸得长”“到处闯祸”的讥诮，坚持“存真”“求实”的精神，发表一些真实的人物史料，促进党的政策的落实。其中最为突出的事例，要算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时三十年冤案的平反。

陈时担任中华大学（还有附设中学和小学）校长近四十年，师生足迹遍于海内外，著名共产党人恽代英、《资本论》

最早的翻译者、前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等，都是中华的学生。台湾前总统严家淦、台湾总统府秘书长沈昌焕，抗战时都在中华教过书。近年来，旅美及新加坡等地的中华学生回国探亲，探听中华的去向，但在武汉鲜为人知。原来老校长陈时已在一九五二年因“恶霸地主”定罪被判刑（有期徒刑十二年，缓期刑二年），一九五三年冬因窘而终。陈时这个人，我们不能担保没有缺点，但他终其一生，一直坚守中华大学，为创办和撑持中学大学，确实费尽了心力，曾享有“北张（伯苓）南陈（时）”的美誉。抗战期间，他拒绝日本友人、当时任驻华公使（后任外相、副首相）的重光葵劝他留汉的建议，保持了民族大节。我们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按照历史事实，连续发表了《陈时与中华大学的几个片断》（作者吴先铭）、《也谈中华大学与陈时》（作者胡治熙）两篇史料。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是《武汉文史资料》的长期订户，看到后，引起了关注。当接到陈时的家属提出申诉时，立即指令当年执法的黄陂县人民法院重新审理。经过重审，认为原案不能成立，系一错案，宣布陈时无罪，原判撤销。这个沉沦三十二年的冤案，终于得到昭雪。这不仅使陈时的家属无限感奋，中华大学的国内师生更是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后来还在有关部门领导下召开了纪念会。”可以测定，远在海外和台湾的中华师生，一旦听到这一消息，必将同感欣慰。台湾不是攻击共产党的土改斗争和肃反斗争的政策吗？今天看到共产党这样“有错必纠”的精神，当应衷心佩服。“一石激起千层浪”，陈时一案的昭雪，温暖了海内外数以万计的中华师生的心。

（作者系武汉市政协文史办主任）

浅议文史资料与地方志的关系

周一青

文史资料工作是人民政协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地方史志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它们的共同点是，都担负着征集近、现代史资料的任务，都要为历史研究，教学部门提供材料。不同之处是，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又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它要通过史料征集，整理出版，促进爱国统一战线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文史资料与地方史志的不同之处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 从时间方面讲，地方史志的论述，是没有上下时限的，上可以追溯到远古，下可以记述到当天；而文史资料由于以“三亲”（亲历、亲闻、亲见）材料为主，要给近、现代史增添内容，因而它的时限是有明确规定，只能上自一八

九八年戊戌变法，下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

(二) 从内容和记述方法讲，地方史以记述地方的人类社会活动为主，记述必须完整，有始有终；地方志对自然与社会现象，要花大的篇幅，作详细的记载；文史资料记述历史事件，并不一定求全责备，可以记述一个侧面，一个片断；记述人物可以记述他的一生，也可以只记述他在一个时期内有影响的活动。(三) 从行文的体例讲，地方史志只能直述其事，文字力求简明准确；文史资料则可以记述当时历史事件发生的环境、气氛、对话等，增加记述的文采。

(四) 从任务上讲，记述山川风物、名胜古迹，是地方志的任务，不属文史资料的

范围，因而文史资料工作不必在这方面花力气。不过，遇有胜迹与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活动有牵连的时候，在记述事件、人物的同时，也可以记述这些胜迹的风貌甚至它的沿革和变化。

以上这些，应是我们征集、编辑、出版文史资料时要注意掌握的原则。当前，在有

的地方，由于对文史资料与地方史志的不同之处区分不清，有的文史资料与地方志内容齐同；有的文史资料工作部门与地方史志部门互相扯皮，甚至互相争史料，封锁消息。为此，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既要与党史办、地方史志有分工，又要搞好协作。

最近看到几本县市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内容，封面，印刷，纸张都算不错，但翻到最后，一张赫赫显然的勘误表便出现在眼前，这就顿时给人以扫兴之感。再细细看下去，读完这十几、二十条正误对照条目，不禁愕然，原来其中绝大多数是不应该错的字！我想这些书的编辑者们在制作勘误表时，也有几分惭愧吧！一本几万字的小书，出现那么多错处，总是讲不过去的。况且搞文史资料工作的同志总是喝过不少墨水的，也知道把好文字关的重要性，可是遇到具体问题，往往就过不了关。为什么？恐怕最主要的是编辑们的马虎，而马虎是源于事业心不强、是缺乏责任感的表现。校样本应该看三遍，他们只看一两遍了事。其次，有些市县为了赶速度，向什么日，什么节献礼，结果

有感于勘误表

李启光

古稀老人撰稿忙

——访醴陵市政协副主席陆承裕

醴陵县政协副主席陆承裕虽已古稀之年，但以惊人的毅力，利用业余时间不畏严寒酷暑几年来撰写和整理了二十万字的回忆录和文史稿件，受到了人们的尊敬。

最近我访问了陆承裕老人。进门见他桌上堆满了文稿书籍，他正赶写长沙会战的回忆录。老人热情接待了我，于是我

匆匆成书，错误就在所难免了。再次，就是一些编辑或校对人员水平较低，文字修养没过关，因此，要他们把文字关，就不可能不出问题了。

要克服这些错误现象，其实也不难，最好的办法是在校对上下功夫，责任编辑要自己校稿，校完后没有把握，还可请文字水平高的同志再看上一遍。有些地方编辑是一个人，校对是另一个人，这种编校脱节的现象往往容易出疵漏。过去邹韬奋办刊物，都是亲自校稿的，毛泽东在延安给《解放日报》写社论也自己校阅，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只要我们在思想上真正重视，在编辑校对上真正把好关，勘误表终将是可以消灭的。文史资料的质量也会大大提高，它所发挥的作用也会大大加强。

们毫无拘束地交谈起来。

陆老开始写回忆录是时，帮朋友应付“差事”，那是1979年底，老同事陶富业接到全国政协文史办的征稿启事，约写国民党陆军大学的回忆。时陶已半身瘫痪，记忆力极差，不能执笔，执意请他帮忙，陆写好寄去后，很快就收到鼓励的复信，说写得简明扼要，很好！除附来征稿通知外，还出了两个撰写题目。陆承裕是起义人员，1953年被错划为反革命，判处无期徒刑，后虽提前释放，但政策没彻底落实，心灰意懒，正考虑写与不写，醴陵人民法院给他送来了平反纠错裁判书，不仅恢复了干籍，市政协还选他当了政协副主席，真是喜出望外，他说这是他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他暗暗下定决心，要在有生之年，赶写回忆录，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多作贡献。

到政协后，党内同志对他关怀备至，给他创造了写作的有利条件，通过学习，他初步认识到写文史资料是周总理倡导的，是政协一项以我为主的重要工作。他开始陆续收集资料，1981年他花了整整半年时间，帮全国政协常委李觉整理了十万余字的文稿。接着边学习边写作，本着求真存实的精神，从自己最熟悉的事开始，写跟随何键、刘建绪的回忆文章，1982年脱稿八篇，计三万八千多字。1983年醴陵市党史办转来江西省党史办的信，请他写何键、刘建绪进攻湘赣省红军的军事行动，并要求将师长以上姓名简历写明，他不畏盛夏酷暑，反复查对核实，写了一万三千字的资料寄去，江西收到他的稿子后，认为这是难得如此翔实的资料。1984年又为省、市写稿七篇。

今年应省、市文史办之约，陆老写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稿共约二万余字；并着手写何键、刘建绪与第四军始